

21 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

中国古典文献学 教程

陶敏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3

D00123952

21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

中国古典文献学 教程

主 编 陶 敏

副 主 编 吴广平

编写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汤力伟 孙海洋 李一飞

郭瑞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 / 陶敏 主编.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I. 中… II. ①陶… III. 古文献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453 号

21 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

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

主 编 陶 敏

责任编辑 周志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慈利县一中印刷厂印刷

787mm×1092mm 1/16 开 印张 12 字数 240 000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55-4116-X/G·4111

定 价 25.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文献——古典文献学——学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和意义——怎样学习 古典文献学	
第一章 古代文献的类型	5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载体类别	5
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缙帛文献——抄本文献—— 印本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文献的装帧	
第二节 古代文献的典籍分类	11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典籍文献——史部典籍文献——子部典籍 文献——集部典籍文献	
第二章 古籍的版本	16
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16
版本——版本学——版本学的功用	
第二节 版本的鉴定	23
纸书的装帧形式——版本的记载——版本的种类——版本的鉴定—— 避讳学与版本鉴定——版本鉴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善本及其选择	33
善本——足本 精本 旧本	
第三章 古籍的校勘	37
第一节 校勘的目的、原则和对象	37
校勘的目的——校勘的原则——校勘的对象	
第二节 校勘的方法	46
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勘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三节 校勘工作的具体操作	53
版本的确定——校勘操作——校勘成果的处理	
第四章 古籍的目录	58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58
目录——目录的结构与功用——古代图书分类法	
第二节 目录的类型	63
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三节 目录的利用	68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中国地方志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	
第五章 古籍的辨伪	74
第一节 伪书及其成因	74
伪书与辨伪学——伪书的种类——伪书形成的原因	
第二节 辨别伪书的方法	83
查历代书目——查书的内容——查书的语言文字和文体风格——查此书与它书的关系——辨伪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三节 伪书的利用	93
第六章 古籍的标点和注释	95
第一节 古籍的标点	95
句读与标点——古籍标点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难点——古籍标点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古籍注释的体式	100
古籍注释体式及其流变——古籍今注体式	
第三节 古籍注释的内容	103
训释语言文字——注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注明词语出典——补充有关史料——文学作品注释的特殊内容	
第四节 怎样做好古籍注释	107
充足的知识储备——善于利用工具书——对注释对象作总体把握——注释以校勘为基础	
第七章 古代文献的编纂	112
第一节 古代文献编纂概述	112
古代文献编纂的目的和意义——古代文献编纂的原则和要求——古代文献编纂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文献辑佚·····	116
辑佚的意义——辑佚的目的和要求——辑佚的方法和途径	
第三节 文献史料汇编·····	120
史料汇编——总集的编纂——考述型著作的编纂	
第八章 文献考据·····	125
第一节 考据与考据学·····	125
考据的目的和意义——考据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考据的对象、方法和原则·····	127
考据的对象——考据的前提和条件——证据及其类型——逻辑推理在考据中的运用——考据的过程	
第三节 传统考据的继承与更新·····	138
传统考据学的成就与缺陷——二重考据法及其他——考据学的继承与更新	
附：考证举隅·····	14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	142
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节录）·····	145
第九章 古代文献的检索·····	148
第一节 文献检索的意义、方法和途径·····	148
文献检索的意义——文献检索的方法——文献检索的途径——文献检索工具及其排检法	
第二节 古代文献的检索·····	152
古代文献的检索——古代文献研究论著的检索——古代文献中史料的检索	
第三节 现代技术在古文献检索中的应用·····	158
光盘数据库——计算机网络检索——与古文献研究有关的重点网站	
附：四角号码索引（选自《辞海》）·····	163
研修书目·····	165
后 记·····	167

导 论

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献,贤者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刘师培《文献解》对此做了更加明确的解释:“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征,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这就是说,孔子所说的文献不但包括典籍,还包括人们口传身习的各方面的知识。

最早用文献一词来名书的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在书的《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端临虽然把“文”和“献”做了明确的区分,用“文”来指叙事的经史,用“献”来指论事的言论,但后者实际上也属于古代所说的“文”的范围。因此,马氏所说的“文献”实际上偏指“文”,即包括图书典籍在内的一切文字资料。这是对于文献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后来人们常说的图书文献、文献典籍等,都沿用了这一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献的概念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变。国家标准局公布的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新版《辞海》:“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自然将各种文物和音像制品等都包括在内,是广义的文献的概念。

古典文献学中所说的文献,是指狭义的文献,即一切有意义的语言文字的记载。这里,我们把文献和文物适当地区别开来。因为,尽管文物也属于广义的文献,许多有文字记载的事物本身也就是文物,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文献研究和文物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古典文献学 文献学以古往今来一切文献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学则是研究古代文献的物质形态、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我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整理起源很早。周秦时期是文献学的产生时期。据《国语·鲁语下》记载,正考父曾“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可说是见诸史籍记载的第一个文献整理者。相传孔子曾删《诗》,编《书》,序《易》,述礼乐而作《春秋》,是全面地整理古代文献的第一人。他的无征不信、择善而从、“多闻阙疑”等

思想观点对于文献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汉时期是文献学的形成时期,经学的发展推动着注释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皇家典籍,始立“校讎”之名,总结了一整套整理文献的原则和方法,促进了校勘、版本、目录等文献学分支学科的建立。魏、晋至宋、元时期是文献学发展的时期,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有了新的发展,辨伪、编纂、辑佚、注释以及金石文献的研究整理方面,成绩尤为显著。明清时期是文献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文献学的各个分支都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如阎若璩之长于考证辨伪,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于训诂校勘,黄丕烈、傅增湘擅于版本目录等,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文献学一词的出现是20世纪的事情。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典藏之学,又称校讎学,主要以文献中的书籍为研究对象。随着观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文献学作为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内容远非校讎学一词所能涵括。1923年,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①梁氏对于“文献学”的概念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但从全书不难看出,它实际上包括了古代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版本、目录、校勘、训诂、注释、辨伪、辑佚以及考据之学。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书的《导言》指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②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整理及其传播、开发和利用确定为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将它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考古学等区别开来,促进了各自学科的独立发展。张舜徽说:“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③对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作了更为明确和科学的规定。

古典文献学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文献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文献本身,其次是文献的文本,再次是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同一种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载体不同、载录方式不同、载录的目的和内容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形态,于是有版本之学;文献大量产生,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对它们加以整理归类,于是有目录之学和典藏之学;文献产生和流传中往往有作者、书名或时代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于是有辨伪之学;文献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产生文字的讹误、篇章的散佚,于是有校勘之学、辑佚之学;由于时代的变迁,原有事物已经消亡,人们对文献中的语词、事物、典章制度等难以理解,于是有注释之学;文献数量极多,内容庞杂,史料分散,不便利用,于是有编纂之学、检索之学。至于考据学,则是文献研究的

① 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②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③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4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第1版。

一种基本的方法或手段,不论文献本身的真伪,还是文献中史料的真伪,乃至一书的版本、一字的正误,都必须进行严肃细致的考据方可解决。实际上,文献学这些学科分支是相互联系、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

学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和意义 学习古典文献学首先是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中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 陈寅恪在谈到输入西方思想问题时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 2000 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② 我国正处在全面改革和开放的时代,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席卷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怎样既融化新知又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优秀传统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摆在青年一代面前的历史任务。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我们要很好地继承这份遗产,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古典文献学正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宝库的开启之钥。

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为了打好从事文献整理及一切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都必须经历一个搜集、鉴别、理解和运用材料的过程,而材料要搜集得全,鉴别得真,理解得透、运用得活,就离不开文献学。例如,不明目录,就难以找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不明版本,就无法确定最好的书籍版本;不明校勘,就无法判断文本的优劣正误;不明考据辨伪之学,就无法鉴别文献或史料的真伪;不明训诂注释之学,就无法正确理解文献文本的意义。总之,如果不懂得一些文献学的知识,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或者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所以说,文献学可以说是治文史之学必由的门径。

学习古典文献学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我国古代的学者在文献整理研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形成了无证不立、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一系列学术规范。建立在文献整理研究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古典文献学,不但是文化遗产宝藏的开启之钥,治学的必经之门,而且是传统学术文化中最具有民族特色、最富于科学意识、最能为今人所直接利用的部分。认真学习它,可以加强我们的思维的训练,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

怎样学习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是从事各种专门学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7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5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

科学研究的基础，它的建立和发展又要以各种专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因此，要学好古典文献学首先需要掌握广博而扎实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其中最基本的是古汉语知识和古代文史知识。

古代文献是古代记录于各种载体的语言文字资料，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利用、研究和整理，首先必须具备必要的古汉语知识，即关于古代汉语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各方面的知识。古籍的校勘、标点、注释固然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古籍的辨伪、史料的考证更需要精深的古汉语知识。

利用、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献还必须具备必要的古代文史知识。所谓古代文史知识既包括古代历史、地理、官制、礼法、民俗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天文、历法、考古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且知识越是广博，就越易于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

利用、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献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古代文献包罗万象，涉及种种其他学科，所以如果从事某一方面的文献研究，不但要具备文献学和古代汉语、古代文化历史的一般知识，还要对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例如，研读文学文献，就必须具备较多的古代文学的知识，研读宗教文献就必须具备较多的宗教和宗教史的知识等。

其次，要在实践中学习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来自实践并服务和指导人们的实践。它在人们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保存、利用、研究、整理文献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今后，也必将随着人们的实践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学习古典文献学必须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时刻关注文献的问题，并且自己动手来做一点标点、校勘、注释、考辨的工作。只有在实践中学习，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才能把古典文献学学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第一章 古代文献的类型

古代文献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按照文献的载体，古代文献可以划分为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纸质文献、音像文献等；按照文献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历史文献、宗教文献、文学文献、医学文献等；按照文献发现和流传的情况，又可划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其中的纸质文献又可以按照文献的形成方式分为抄本文献、雕版印刷文献、活字印刷文献、现代复制文献（如照相、珂罗版、复印）等。此外，按照文献形成的时代、涉及的地域、纪录的语言等，还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别。不同类型的文献，其内容、载录特征、史料价值、整理方法等往往各有特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则根据古代各种典籍文献的内容和体制，将它们划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不同的类别。对于各类文献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才能掌握它们的特点，正确地判断其价值，快捷地进行检索，更好地加以利用。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载体类别

古代文献的载体，就是指古文献赖以依存的物质形式。文献和文献载体是同时出现、相互依存的。我国古代载录文献的物质，有龟甲、兽骨、金、石、竹、木、帛、纸等。文献载体经历了由专门复杂向普及简易的方向不断发展的漫长过程，载录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保存和传播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献 记载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献。汉文字产生于上古时期，但商代以前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发现。商代处在奴隶社会的阶段，文化由少数贵族垄断，主要掌握在巫、史两类人手中。巫沟通人神关系，记录神的启示；史记载贵族统治者的言行。他们的记录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形成了古代最早的文献，就是甲骨文。商人信鬼而好巫，凡是进行祭祀、战争、狩猎、农事等重大活动，都要进行占卜。占卜的材料主要是龟甲和兽骨，龟甲用乌龟的腹甲，兽骨则用牛（少数用猪、羊）的肩胛骨或胫骨。考古学家描述当时占卜的方法是：“卜时削治甲骨，于其里凿一椭圆之渠，上博而下狭。复于圆旁凿一小洼，如☉形。以火在洼处灼之，则坼纵横见于表，如丫卜形，所谓兆也。……其兆侧刻卜辞，有两面刻者，有未卜而刻卜辞者。”^① 这些记载占卜的卜辞，就是甲骨文（见图一）。它们客观地反映了殷代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是研究殷代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人们可以从中认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

^① 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4期。

甲骨文最先出土的地点在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殷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了市场上作为药物出售的“龙骨”,加以购藏。此后,在殷墟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中不断有甲骨文字的发现。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编著的《铁云藏龟》选拓了王氏的部分藏品,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籍。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殷虚书契续编》和王国维的《殷虚书契续编》等都是较早的考释甲骨文的重要著作。王国维的《殷虚书契续编》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利用甲骨卜辞提供的史料证实或订正了《史记·殷本纪》有关殷王朝世系的记载。他的一系列论著“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开始了史学界由疑古到释古的转变。此后,郭沫若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等。编印甲骨文字的还有

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及其后编与续编,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虚文字》甲、乙编,1955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殷虚文字缀合》等。1978—1982年出版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3册,选收甲骨41956片,收录最为完备。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收录甲骨文4500余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13000余片,它们和《甲骨文合集》一道为甲骨文字和殷代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金石文献 以金属和石头为载体的文献。金指青铜器,即铜锡合金的器皿,包括酒器如尊、爵、盃(hé),炊具如鼎、鬲(lì)、敦,食器如簠(fǔ)、簋(guǐ)、盘,乐器如钟、铎(bó)等,约30余种,亦用于祭祀,称为吉金或美金。殷、周时期,青铜器是极为贵重的器物,被当作统治权力的象征,立国分器,朝享赐器,事大赂器,亡国迁器。贵族将记载重要事件的文字铸在青铜器上面以便长期保存,称为钟鼎文或金文。金文篇幅一般比甲骨文长些,记载了当时战争、祭祀、封赏等大事,可以和传世古籍相印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周武王克商的日期是甲子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日,和《尚书·牧誓》等古籍记载相同。《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昭公二十九年》又有晋赵鞅等“铸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著刑书”的记载。铸在鼎上的“刑书”就类似后来的书籍,有供人阅读的性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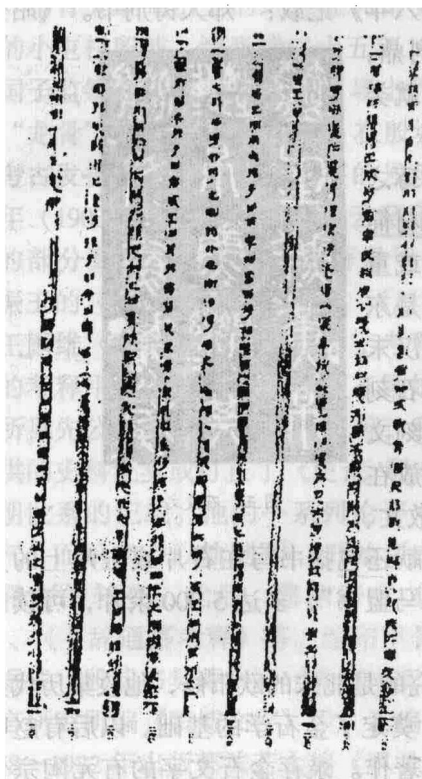
图三 石鼓文

我国古代石刻起源也很早。《墨子·明鬼》说:“琢之盘盂,镂之金石。”已经将金、石并称。由于石料取材简便,价格低廉,逐渐取代青铜器成为记载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事迹的文献载体。现存最早而又可靠的石刻是东周时期秦国石鼓,此外有秦始皇琅琊台刻石等。东汉末熹平四年(175)石经,为石刻书籍。汉、魏以来,石刻碑志兴起,隋、唐时期特别盛行,形成了丰富的石刻文献。碑有神道碑、德政碑等多种。志是墓志,即存放在墓穴中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此外还有诗词、散文、题名等杂刻,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此外,金石文献还包括书写在石片或玉片上的文字。书写在玉片上的文献有1965年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多达5000余片,可读的有600多片,为春秋后期赵鞅和同宗盟誓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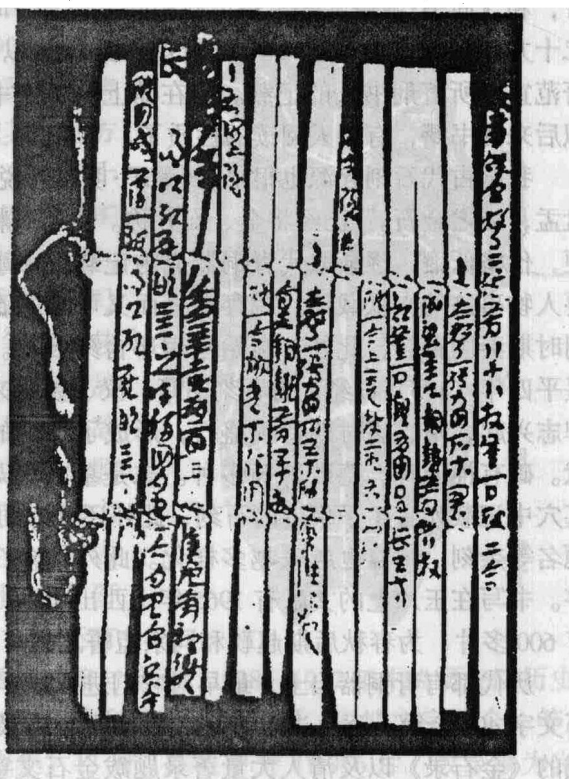
历代都有青铜器出土,最早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是北宋的欧阳修,他收集历代金石文字400余篇,逐一进行考证,著为《集古录》,奠定了金石学的基础。以后有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清人大量著录题跋金石文字的著作。录存金石文字的有元陶宗仪《古刻丛抄》、清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集录金文的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1983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集录石刻文献的有《北图所藏石刻拓片图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收都是石刻原石的拓片。编录石刻文字的则有赵超《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等。台湾出版的《石刻文献汇编》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石刻文献全编》汇编了历代石刻研究著作。

简牍文献 书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文献。简为长条形竹片或本片,牍是方形的木片,又称方或版。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说:“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庄子·天下》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方,就是方形木版。策(册)是由简牍连缀编成,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珍藏的大册叫典。《说文》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可见竹木在殷代就已经用作文献的载体。简牍在汉代依然通行。金石只宜记载单篇文字,缙帛昂贵而易朽,汉代以前,简牍是主要的文献载体。但到目前为止,近代考古发掘尚未发现早于战国时代的简牍实物。

历代都有简牍的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得竹简经书,称为“古文经”。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数十车,武帝



图四 银雀山竹简



图五 木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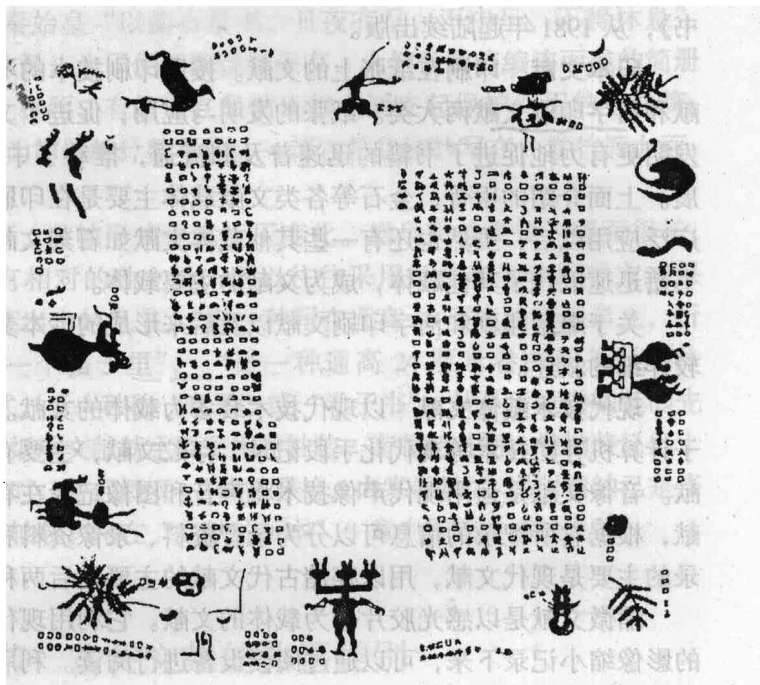
命荀勖整理，得古书 17 种，称为“汲冢书”。20 世纪简牍出土尤多。如甘肃居延汉简前后发掘所得有 3 万多枚。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 4 942 枚，包括《孙臆兵法》等兵书及《尉繚子》、《晏子》、《墨子》等。其他如江陵汉简、郭店楚简、长沙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等，数量都很多，为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学史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甲骨学一样，简牍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缙帛文献 书写在丝织品上的文献。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缙是一种质地较为优良的帛。《说文》：“缙，双丝缙也。”缙帛作为文献载体使用起源也很早。《墨子·明鬼》：“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已经将帛和竹并称。大约春秋时期竹帛并行，汉代帛书才较为普遍。《风俗通》：“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 20 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缙帛质地柔软，体积小，重量轻，便于书写携带，但价格贵，产量小，难于普及。加之缙帛容易腐朽，所以后世发现较少。1942 年，长沙楚墓曾出土帛书一件（见图六）。1973 年 12 月，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一大批帛书，有《老子》、《经法》以及类似《战国策》的书籍（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等，共 20 多种，12 万余字。

抄本文献 主要指书写在纸张上的文献。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汉书·赵皇后传》记有“赫蹄书”，颜师古注引应劭说：“赫蹄，薄小纸

也。”《三辅故事》记载，汉武帝时，太子刘据曾“以纸蔽其鼻”。应劭《风俗通》说：“光武车驾徙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①说明东汉初期，皇家已有纸质文献的收藏。纸既轻便，又取材方便，价格低廉，可以大量生产，所以迅速取代了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东汉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王隐《晋书》：“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漉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②《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可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经成为文献主要载体，普遍沿用至今。



图六 战国帛书

唐以前的抄本文献，国内出土较少，但在日本有较多的留存。今存大宗的古抄本文献主要有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敦煌遗书指存放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抄本文献。1900年6月，道士王元篆无意中发现了这批文献，腐败的清政府得知后未加保护，遂被俄、英、法、日等外国探险家所掠夺，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地，仅少部分入藏当时的京师图书馆（现藏北大图书馆）。敦煌遗书总数约在5万卷左右，其中90%以上是佛经，其他文献虽仅占10%，仍蕴藏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宗教、历史、地理、文学等各方面的史料。遗书发现后不久，我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就开展了研究工作。由于原件远藏国外，解放前的研究工作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现《英藏敦煌文献》和《俄藏敦煌文献》已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提供了较完备的研究资料。

吐鲁番文书指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来的古文书，总数在3万件左右，以汉文文书为主，包括藏文、回鹘文等数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内容主要是各种官私文书和一些古代典籍、杂书。其中解放后出土的文书，已由文物出版社整理编为《吐鲁番出土文

①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第4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② 转引自《北堂书钞》卷104。

书》，从1981年起陆续出版。

印本文献 印刷在纸张上的文献。按照印刷技术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雕版印刷文献和活字印刷文献两大类。纸张的发明与应用，促进了文献物质形态的变化，印刷术的发明更有力地促进了书籍的迅速普及和流通，推动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迅猛发展。上面介绍的甲骨、金石等各类文献载体主要是在印刷术发明推广以前通行。印刷术广泛应用以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其他载体文献如石刻文献、抄本文献等形成，但印刷的书籍迅速取代了其他载体，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

关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文献以及后来形成的抄本文献，将在“版本学”一章中作较详细的叙述。

现代技术载体文献 以现代技术装备为载体的文献。它以视听技术、缩微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存贮技术等现代化手段记录、存贮文献，主要有音像文献、缩微文献和机读文献。音像文献是运用现代声像技术将声音和图像记录在有关载体上并使之再现的新型文献，根据它所记录的信息可以分为录音资料、录像资料和音像资料三种。音像文献所记录的主要是现代文献，用以存储古代文献的主要是后两种。

缩微文献是以感光胶片作为载体的文献。它利用现代摄影技术，用胶片把文献资料的影像缩小记录下来，可以通过阅读设备进行阅读。利用它可以缩小藏书空间，代替和保护珍本秘籍，保存较为长久。但阅读利用时需要各种辅助设备，不如书籍方便。

机读文献是指通过电子计算机阅读的文献。它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文献的文字或图像变成数字语言和机器语言，存贮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上，通过屏幕显示装置进行阅读。它的特点是信息容量特别巨大，检索特别快捷方便。如光盘版的电子读物《国学宝典》，一张光盘存储古籍字数达3亿5000万字，而且可以全文检索，制作卡片。

文献的装帧 随着文献载体的变化，文献的装帧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金石文献，往往一件器物或一块石刻，就是一件完整的文献，无需连缀。需要连缀的金石文献限于个体的形质，也无法连缀。例如，东汉的熹平石经可以说是石刻书籍，但它由一块块笨重的碑石组成，就只能采取排列的形式。

我国古代的书籍最早是实行简册制度。竹木简牍，采用编册的形式，用皮或麻制的绳索连缀在一起，称为“简策”。《说文解字》说：“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籀，古文册从竹。”《说文》又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由此看来，典册是简牍文献的装帧形式。但《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似乎殷商时代就有典册制度。安阳出土的龟甲，有的是许多片非常整齐地放在一起的，考古学家在整理时还发现有两片龟版连在一起，揭开以后，发现上面有“册六”的字样。可见殷墟的龟甲并不是无意义的堆积，而是经过整理排列的，殷代的档案采用的也当是编册的形式，人们称之为“龟册”。不过，至今没有较完整的实物发现。

周、秦及汉，简牍是文献的主要载体，简册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读的就是书写在简牍上、编成策的《易》。简策笨重，所以《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惠子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才能

装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阅读的文件书籍要用秤来称量。为了便于阅读和保存,人们常常将编连而成的简册卷在一起,在首简或末简上写上标题,有的还在最前面加上两支起保护作用的空白简,称为“赘简”。于是“卷”就成为简册的计数单位。一篇古籍往往抄写在一卷竹简上面,一卷也就是一篇。

文献载体由简牍变为帛、纸,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缣帛质地柔韧,幅面很长,书写的内容也较简牍为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往往采用折叠和卷轴两种方式保存。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有一种写在通高48厘米的宽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放在漆盒下层的一个格子里”,“另一种通高24厘米卷在长条形木片上”^①,就分别采用了这两种方式。后一种称“卷子”或“卷子书”,就是后世卷轴装的先驱。纸张性脆易断,不便折叠,纸质文献就主要采用卷轴装。南北朝时期,卷轴装已经十分流行。梁代阮孝绪编《七录》时,曾经慨叹:“倘欲寻检,内寡卷轴。”说明卷轴已是当时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关于卷轴装,将在“文献的版本”一章中作较详细的说明。

第二节 古代文献的典籍类别

文献的载体类别,主要涉及文献的物质形式。不同载体的文献,具有不同的特点,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和利用。但是,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文献典籍,只是从物质形式进行分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古代文献的典籍类别,即古代根据内容对文献典籍所作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们。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我国古代历史源远流长,形成和聚集了浩如烟海的文献,现存传世的古代文献最基本构成部分是书籍。传世典籍的数量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据估算,总数在10万种以上。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典籍的内容和性质,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的类别。

四部分类法产生于魏晋时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伎”六大类。魏秘书郎郑默《中经》,始分典籍为四部。晋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将典籍“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隋书·经籍志一》)。东晋时著作郎李充作《元帝四部书目》,采用四部分类法,但改变了名称和顺序,“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②。唐初撰《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取代甲、乙、丙、

① 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② 《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